

我在南京光复前后的经历

金 鸿 声^①

光绪三十四年(一九〇八年)九月,我在无锡胡埭镇“杨兴盛”糟坊学生意,满师后一年有两块钱的工资。我们九个青年凑钱去南京参观“劝业会”。到南京后,就到陆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看望杨文锦(胡埭人)。到营房门口一问,杨文锦正在上操,我们就在那里等了一会儿。下操后,他就陪我们进去,领了入场券(去参观劝业会要入场券),还有一个同乡叫陈家宝,碰到我说,你也好报名参军了。我就去报到处报名,但是当时我未能立即参军。报到处的人告诉我,明年给你个讯,你接到信就能入伍了。我没有办法,在南京参观了劝业会后,就回无锡了。

宣统元年(一九〇九年)十二月二十日(阴历),我上午到胡埭街上去,信局送信给我,我一看是南京来的通知,那信足足走了九天。我马上回家对父母谎称要到上海去一趟,于是,在当天赶到南京第九镇三十三标报到处报到,被编在二营前队三排二棚,营长是冷通(御秋)。我到部队以后,没有立即给家里写信,到第二年的三月,才给家里去了封信。后来家里来信说我娘在家里吵,不让我参军。九月中旬,我父亲到南京看我,那时部队驻在中正街里向铺,父亲要我回家,我不肯。

^① 金鸿声现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。

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，长官对我说：“你今年有二十九天假期了。”我打算在春节回家探亲，但长官说不行，现在不探亲就作放弃。这样我才和无锡县东亭镇的一位同事回到无锡，住在他家里。过了两天，听说京沪铁路中断，我感到很奇怪，赶到无锡一打听，原来是因为武昌爆发了起义。我原不准备回家，想到上海去玩几天，然后早点回部队销假，又怕回家后，父母不让我回部队，所以决定不回胡埭。没过几天，听说苏军先锋营在苏州招兵，我就乘火车赶到了苏州。

招兵所在地设在留园，同乡许德宽和吴浩也在那里。吴浩问我怎么来了，我说探亲回家的，并把经过说给他听，说想回原部队去。他说：“不能去了，三十三标也没有了，你就留在这里吧，等攻下南京后，如果原部队还有，你再去吧。”苏军先锋营在苏州招一营人，人招齐后开到镇江、龙潭、高资一带修工事，枪械是从日本购来的，原有的五千支俄国枪不能用，主要是保险不好，一排子弹打过后就发烫，后才由日本的明治二式调换了。粤军也在附近集结待命。

约一个月以后，任务布置下来了，粤军攻太平门，苏军、沪军攻紫金山、天堡城，浙军攻雨花台。一天夜里十点钟以后，突然吹起了紧急归队号，传达紧急命令，要我们支援浙军攻打雨花台。在高雨花台三、四里路的地方，就听到隆隆的机关枪和重炮声。我们赶到即投入了战斗，经过一番激战，攻上了雨花台。这时天已蒙蒙亮，浙军在先，我们在后，从雨花台进入南门。我们集合一点名，开上去两排人，只剩下四十来人了。接着我们给阵亡将士收尸，因这次伤亡相当大，也无法买棺材安葬，就在雨花台旁挖了个坑，将这些阵亡将士掩埋了。

我们先锋营部队进攻南京时是由标统朱宝成统带的。攻下南京后，朱宝成将部队留在南京，准备北伐，他本人回到浙江整顿留

浙部队。我们就由师长洪承典、团长吴浩带领。外围是三营，一、二营负责总统府的警卫。

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任大总统。孙中山先生到南京后，抽我到内务部去传令，在此以前，我已去了几次。成立总统府后，传令人手不够，又另挑了十九名青年派到内务部去。我们的任务是，在孙总统办公室外面接到名片后送进去交给传令官，再由传令官送给孙总统，一般将名片送给传令官的任务总是由我担负。

孙总统办公室是一座西式小洋房，里面是总统的办公室，外一间是传令官的办公室。孙总统的生活非常俭朴，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服务员，吃开水都是自己倒。孙总统平易近人，态度和蔼可亲，原来我进去见到孙总统和传令官总要敬礼，孙总统说：“在总统府里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礼节就不要了。但你们出去，军容风纪一定要好，看见别的长官也要敬礼。”从此，我们进出都不敬礼，很随便了。我们的传令官一共有六个，许德宽兄弟两人，还有一个福建人，一个广东人。有一次，孙总统和传令官一起讲话，他们讲的广东话我听不懂，孙总统用普通话笑着问我：“我们说话你听不懂吧！”我也笑着说：“听不懂。”

选大总统是由全国十七个省的代表在南京进行的，他们一致推选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。当时，浙江朱司令的部队留在南京准备北伐，黄兴也主张北伐。在大总统就职典礼上，孙总统讲了话。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推翻清政府。

在全国一片声讨中，清朝皇帝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被迫下了诏书，宣布退位，清帝国就此结束。之后不久，孙中山就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，在南京设立留守府。这时第七师解散，吴浩带我们一团人参加了南京卫戍团。因此袁世凯做总统后只发

给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，南京的部队军费十分困难，我们就又归并到徐州第三师。孙总统在临别时召集我们讲话说，你们是正规军，现在二十五团已退伍，要给你们办理退伍手续。临别时，孙总统发给我们警卫人员每人两块手帕。手帕是白的，上用红字印着“汉族存亡，在此一举，大总统孙文”。这手帕我保存了三十五年。

我们团归并到徐州第三师，师长是冷遹，他对下级也很关心。在南京时，我们常做器械体操。这种操很伤身体，所以做操时，每人发一瓶虎骨酒，我因为不会喝酒，就将虎骨酒送给同事喝了。冷师长知道后就对我说：“发给你虎骨酒怎么不喝？”我说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他说：“做器械操很伤身体，这是给你补身体的，你虽然年轻，但仍要注意身体。”后来又给我补发了一瓶虎骨酒。归并徐州第三师时，我们是步兵第十一团，那时我已是上士了，冷遹看到我后，就对团长吴浩说：“这个孩子很好，你要多关心他。”讨袁前夕，我就升为司务长了。

一九一三年三月底，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的特务武士英暗杀。此事震动了全国。七月份，南京宣布独立，下半月又提出讨袁，由黄兴任讨袁军司令。我们团攻打韩庄时，先由广福军张宗昌骑兵团首先冲过韩庄。广福军打仗百战百胜，骑兵团是由张宗昌带过来的关外人，敌人看到他们就害怕。那时第八师已接了第三师的班。在我们向韩庄进攻时，我在铁路天桥上冲锋时脚上挂了彩，开始没有感觉，后觉得皮鞋里湿了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脚背上都是血，红十字会立即给我包扎，送我到徐州休养。

正在我们攻打韩庄时，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却不辞而别，讨袁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。我在徐州养伤期间，吴浩将我们团带到了南京，只有千把人左右，作为南京的卫戍团。红十字会将我送到南京交给吴浩团长，那时我伤还未痊愈。不久吴浩又扩充了一个

旅，自己成了卫戍司令，任命我为卫戍司令部的中校副官，吴浩还兼任第五旅旅长。何海鸣叫吴浩出来，宣布“函通各师，取消独立”，并在南京张贴布告（布告刻印了一整夜）。“函通各师，取消独立”是团长以上军官到讨袁军总司令部开会时宣布的，这个情况士兵们都不知道。布告贴出去后，南京很平静，不料夜里十二点，何海鸣又回来，自称讨袁军总司令，仍要独立，继续讨袁。这时士兵中有反映，说“吴浩私通袁党”。何海鸣说，布告之事，并不是吴浩私通袁党，而是有袁的人混入了司令部，我们已派了密探出去，查出就地正法。这样一反复，南京就乱了，我们一旅人自动解散，吴浩在英国人保护下到了上海，在上海又被暗杀党打中一枪。何海鸣也走了。那天晚上旅部只剩一个参谋、一个军需和我三个人。我先到朋友家住了两天后在大胜关乘轮船回家。到家后听到吴浩受伤的消息，还到上海去看过他，他的伤还未好。我回家后感到很苦闷，想想参加革命几年，革命没有成功，虽然清政府是推翻了，袁世凯却上了台，人民生活还是很苦。几年以后，我听说孙总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，打电报给洪承典，要求在南京的连长以上军官都到广东去，旅费到广东报销。我即去找吴浩，但他一味赌博，不闻这些事。我又到上海找洪承典，洪叫我去找许德宽，但许不想去。我一时筹不足路费，因此广东就未能去成。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事而感到遗憾。

（金赛珍根据口述整理）